



西方马克思主义
现代性理论研究丛书

图像的狂欢与幻境的超越

现代性理论视域中的视觉文化研究

刘伟斌◎著

Beyond the Revelry and Illusion of Image
Visual Culture Research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Theory



人民出版社



西方马克思主义
现代性理论研究丛书

图像的狂欢与幻境的超越

现代性理论视域中的视觉文化研究

刘伟斌◎著

Beyond the Revelry and Illusion of Image

Visual Culture Research in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ty Theory

责任编辑:崔继新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封面设计:林芝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像的狂欢与幻境的超越:现代性理论视域中的视觉文化研究/刘伟斌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01-019644-2

I. ①图… II. ①刘… III. ①视觉艺术-文化研究 IV. ①J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79898 号

图像的狂欢与幻境的超越

TUXIANG DE KUANGHUAN YU HUANJING DE CHAOYUE

——现代性理论视域中的视觉文化研究

刘伟斌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5.25

字数:256 千字

ISBN 978-7-01-019644-2 定价:5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总 序

陈学明 韩秋红

有人这样描述历史:16 世纪是意大利人的世界,是因为意大利人兴起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更是因为这样的运动发现了人、自然;17 世纪是英国人的世界,是因为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机,更是因为这样的发明代表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出现;18 世纪是法国人的世界,是因为法国人掀起了大革命,更是因为这样的革命送给人类百科全书;19 世纪是德国人的世界,是因为德国人在欧洲的上空演奏了第一把小提琴,更是因为“第一把小提琴家”是马克思。如果说这样的描述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这一道理在 20 世纪再一次得到证明——马克思是 20 世纪当之无愧的伟人。20 世纪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以马克思命名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借助马克思之名标榜自己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成为 20 世纪人类历史上班斓驳杂的重要章节。因为 20 世纪的人类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与巨变,发生在思想领域的一系列事件无疑是这一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的冲突与融合,新的分化与对峙,新的竞争与较量都在世纪的舞台上一幕幕上演,在这样的时代中或明或暗地蔓延。在这股思想大潮中,诞生于 20 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渐渐发出了较强的声音,体现了当代思想文化的分化和多样化的格局。它不仅源流学派异彩纷呈,而且伴随着自身理论的深层转变而日益呈现出综合发展的趋势;同时这一令人捉摸难定的趋势,又隐约显示出深远的历史渊源、文化背景以及学理的传承相继。

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哲学进入 20 世纪后别样的一支发展分流,既保留与继承了西方传统哲学的思想特质和价值关怀,又生发出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 20 世纪所具有的现代性批判的时代特征和现实品格。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古代哲学(古希腊)是以后各种哲学的发源地,其他现代西方哲学都生发于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之上,绽放于源自古希腊哲学思想之树的枝头,那么西方传

统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也拥有着“欲说还休、欲语未流”的“未解情缘”。不能否认,西方传统哲学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发展的母体,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历史背景、传统内涵、思想质地、问题渊源、理论风格和民族情怀,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独自散发出自身的理论芬芳,也没有忘怀久远和厚重的西方传统哲学所无私提供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养料。我们正是在西方传统哲学宏大的思想背景下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传统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转向的意义上挖掘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深蕴的传统情怀、当代话语和未来之意。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派个性独特的理论学说,他不强调在近代知识论的意义上构建体系,不追求自身学派内部的概念明晰。众所周知,“西方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总体上的称谓,仅仅因为都注重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而同属一门,表征着这样一个既具有某种共同理论基调,又色彩斑斓、内容庞杂的理论运动。与其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知识体系,不如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叙事范式;与其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学术流派,不如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场社会运动或社会思潮。与其说是在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础上生发的西方现代哲学流派,不如说是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转向。事实也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将自身的发展寄予其他理论学派的身上,演发出“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从另一个侧面表征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众多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纠缠”。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一样,共同延续着西方传统哲学的思想传统,共同捕捉着现代西方哲学的时代脉搏,两者共处在同样的时代,相遇在共同的地域,面对着同样的困惑,思考着人类的命运。以共同的话题,不同的话语方式,使自己的现代性理论的独特话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使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和现实语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所谓的“一奶同胞”的“兄弟姐妹”;在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力求成为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一分子时,也使人们不得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刮目相看。所以,探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各流派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同与异,成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内在需求。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场命运多舛的社会运动,浮浮沉沉,立场波动。但是如前所述,其唯一变动不居的立场就是强调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联。西方马克

思主义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超越政治意义而具有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它反对诠释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和教条化倾向,开创了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传统教科书(苏联意义上)的批评,并以此标榜自我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冲破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樊篱,在一定意义上去拓展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断裂,又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身的否定性思维、辩证性方法和发展性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起到了断裂传承、起承转合、继往开来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无疑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理论背景和思想资源。在理论研究中自觉深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在比较中彰显各自理论的特质和立意,在互动中促进双方理论的融合和再生,在对话中澄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支深具历史使命感的批判思潮,是西方哲学从古至今逻辑发展的当代传人。西方马克思主义观照现代西方社会的社会现实,关注现代西方人的生活状态,关怀现代西方人的精神出路。与众多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一同担负起实现西方哲学现代转向的历史重任。现代西方哲学流派不约而同地将哲学的视角从理性的天国转移到社会生活的现实,从关注思想的客观性、追求真理的普世性转移到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困境、追求现代人的生存意义。意义问题成为当今时代最具亲和力和感染力的词汇,成为当今时代新的主题与价值内核。西方马克思主义以自己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为特色,批判物化问题、日常生活异化问题、人性异化问题、女性问题、生态问题,等等,旨在说明现代西方社会是一个“不健全的社会”、“单面性的社会”、“病态的社会”、“总体异化的社会”、“患了社会健忘症的社会”等。在一定意义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努力想当个好的“医者”,试图通过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全方位诊疗,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不合理性及其带给人类的异化状态,用尽智慧、挖空心思地为其开出各种药方,为人类社会更好的发展努力指路。只是这些药方充其量是纸上谈兵,而无现实疗效,更是殷切强调药方与马克思的不同,而无真正疗效。故此,我们愿意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众多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作的努力异曲同工——共同实现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转向。

然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众多其他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相比,又是另辟蹊径、别有风格的。虽然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实现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向,但是各

自理论的出发点与矛盾争锋的焦点以及理论的最终旨趣却不尽相同。现代西方哲学家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透视西方社会的生活现实,提出不同的拯救方案,表现为不同的哲学转向。针对生活世界的合理性危机,现代西方哲学的非理性主义者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近代的理性主义,认为理性并非人类的全部,“客观”的面孔、“理性”的外衣、“真理”的话语遮蔽了人的肉欲和激情,扭曲了人的生命本性,非理性才是人的生存根基,无论是他们提出的“权力意志”、“生命冲动”,还是“潜意识说”等,都表现出对非理性的崇拜、对理性的反抗和对自由的追求。近代理性主义的大厦轰然坍塌,“非理性”从地基中生长出来,接受阳光雨露和人类的审视;生存论哲学家们试图为现代西方人普遍存在的道德失落感和精神虚无感重新构建根基。他们重新梳理了哲学史,区分“存在”与“在者”,指出“存在的遗忘”是哲学之所以无力和衰亡的主要原因。他们从“此在”出发重新构建本体论,以生存论代替实在论,赋予生活世界以新的意义,生存论哲学家倾向于为存在的意义——“此在”摇旗呐喊,为生活世界增添价值维度,为人的真实生活增光添彩,使生活回归“事情本身”;语言学哲学家们认为哲学之所以不能为社会提供精神慰藉,在于传统哲学对语言的“误用”,因此一方面要对哲学语言进行“净化和澄明”,另一方面也要从离开对语言意义的审查而探究思想客观性的认识论立场转变为重视对语言意义的分析和理解。他们强调对语言意义的重视背后实质上是对人生存意义的关怀。语言学哲学家从认识的中介——语言入手,重新构造世界的本体,重新阐释人与语言的关系——人因语言而存在,语言是存在的家,对传统哲学语言观实现了翻转;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将现代西方社会的病态发展归结为现代性的后果,因而反对一切现代性特征,如主体、真理、解放等,以一种极端毁灭的方式“解构”一切“元叙事”,对启蒙以来的现代性精神持抛弃的态度。后现代主义试图通过对启蒙以来以理性为特征的现代性的批判,重新寻求人类的“自由”之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某些方面与后现代主义相似,也将理论的出发点定位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上,试图通过现代性理论穿越近代哲学的禁锢,实现人类精神的当代发展。只不过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现代性的理解与后现代主义不同,对现代性的批判路径也迥异于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所理解的现代性是源自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以理性能力的自觉为思想前提,以挺立个体的主体形象为理论旨趣,以实现“自我感受的自我价值”为实践理想,以追求个性自由与精神释放为目的。理论上以勒

内·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为起点,以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真理大全”为收场,实践中以法国革命为标志,以各种追求自由与解放的民主解放运动为推动,带有鲜明的近代哲学特征。但是这种现代性的后果是人的理性无限扩张、主体形象无边膨胀、实践活动无度僭越,理性封闭在自己的手下无法超越自身。工具理性片面滋长,价值理性被蒙蔽,普遍的人类历史观演变为资本主义输出价值观和文化扩张的幌子,片面追求知识论意义上的真理无法解救人类精神生活的困惑,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幸福的体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遭到质疑。后现代主义正是要批判这种近代形而上学以理性主义为根本特征的现代性,认为现代性的严重后果源自现代性观念本身的错误,现代性在其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的“设计”,“元叙事”只是人类前进道路上一次错误选择。后现代主义将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现代性本身,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批判现代性,“颠覆”一切现代性特征,“解构”一切元叙事表现,试图以一种彻底的不留余地的态度将现代性“全面封杀”。同时,由于后现代主义将现代性只是看作以启蒙为时间点的、断代意义上的一场遗憾的人类选择活动,没有看到现代性本身的历史沿革性。所以,当后现代主义消解现代性的同时,却没有挖掘出现代性中蕴含的历史价值性,割裂了传统与现代的传承,以知性思维破解知性思维而走入尴尬境地。抛弃传统的给养,人类丢失生存的精神家园,走入精神的荒芜之地。后现代主义在消解现代性的过程中也消解了自身,并不能为人类指明一条行之有效的出路。这样后现代主义批判的现代性是一种时间意义上的、以理性为内核的现代性,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是一种解构式的具有毁灭性倾向的思想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将思想锋芒对准现代性,将探寻现代性的问题作为自身的理论立场和思想内容,将重新破解现代性的“密码”作为时代交予自我的历史任务,将探究现代西方人的生存困境、寻找现代西方人的发展趋势作为理论的价值旨趣,将现实批判作为理论的风格,在这些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似乎并无二致。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性的理解、突破和继承发展的态度上却大相径庭,呈现出不同的理论特征和命运走向。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排斥现代性观念,并不否认现代性观念本身的进步意义和人文价值,特别是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现实发展中进一步理解现代性。无论是对物化的批判、对日常生活异化的揭示、对人性异化的展现、对女性问题的表白、对生态

问题的澄明等,都紧紧抓住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社会这个叙事框架和问题阈。正因为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哲学才不只是停留在认识论内部的概念辨析,而具有了更多的实践性色彩和实证性特征。这种对当代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现实批判,深蕴着丰富的价值关怀——拯救真正的现代性精神。所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是站在现代性内部对现代性实现途径的一次修正,是对真正的现代性精神的再次弘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既批判现代性,又不背离现代性;既源于传统,又基于现代;既把现代性看作是人类精神内在否定发展的外化过程,又理解为具有永恒的自我更新的精神旨向,是人类不断自我否定、自我更新、自我超越的精神力量的表达。它不是一种不可逆的线性的时间意识,而是一种螺旋上升、“新旧交替的成果”^①。它的根本特征就是“重生”、“更新”、“革命”。也就是说,它是一个过程,且是一个永远无法完成、永无止境的运动过程;同时是一个不断以否定自身取得进步经验和动力的、自己反对自己的运动过程;它不是凝固不变的模型,也不是业已完善的圆满的普遍规律,而是以自由贯穿始终,以科学和理性为前提,具有开放性、个性的自我超越的过程。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中,现代性是一个人类生存发展的形而上问题,与人类自觉的否定性的历史文化内涵相通,是一种无法超越的历史姿态。现代性与人性具有某种无法拆解的“情愫”。因此,现代性观念本身并没有错误,反而是人类坚忍不拔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精神的显现,错误的只是现代性精神实现过程中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现实途径。所以,格奥尔格·卢卡奇等人才在批判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物化”现象之后,重新建构“社会存在本体论”,指出现代性并不是排斥本体论,而是应该建构与现代精神相一致的具有生成性和开放性特征的新的本体论;卡尔·柯尔施等人才在批判近代理性形而上学一元论和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基础上,提出“总体性”方法,试图继承现代性精神中内在否定的辩证精神;法兰克福学派等才将社会批判理论作为自身学派的主要特征,试图表征自觉地对当下进行“批判与质疑”的现代性要求;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才渴望重建“乌托邦”,追寻人类形而上精神向前发展的灯塔。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排斥后现代主义所极力鞭笞的现代性“元叙事”,主体、本体、解放、实践、历史、自由等仍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非常重要的概念,它只是要

^① 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为这些概念注入更多符合现代性精神内核、更具人文色彩和历史感的思想价值,使这些构筑现代性精神大厦的元素都重新回归现代性诞生之初的美好情境,并带领人类共同走入未来的自由王国。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现代性是一种螺旋上升、“新旧交替的成果”^①,是一种置身于时间洪流之中永不停息地追求现代之义的永恒冲动,是一个转瞬即逝永不停止的漫漫征程,是人不断超越自身不断创造未来的历史足迹,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选择如后现代主义一般极端毁灭式的批判路径——只是为人类的精神徒增了一些“虚妄乏力”,丝毫没有增添任何前行的力量,在解构对方的过程中也肢解了自我——而是在承认生成性、差异性和开放性的前提下思考未来哲学的建设性,建构未来哲学的理想性,推进未来哲学的成长性。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其自身的理论研究表征着现代性的历史传承性,也以其自身的学术态度展示着现代性的思想文化价值和现实实践价值。

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具有鲜明的辩证性、现实性、开放性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待现代性理念,采取的是辩证的态度;对待在现代性理念下生发的现代化运动对社会现实造成的负面效应,采取的是现实性的批判理路;对解救现代性危机的“治疗方案”,采取的是真切而坚定地开出将现代化运动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的“药方”。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够背靠西方哲学广博的理论资源与问题导向,并在解救现代性困境时,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精神”,将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独特的方式融涵取并,从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非僵化的开放性解读,为社会现实问题寻求理论出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特点与旨向,对当代中国道路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与启示作用。

首先,对现代性采取辩证态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为当代中国道路提供合法性、合理性确证的理论资源。当今,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进入新的“历史拐点”,而在这个新的“历史拐点”上,中国所要探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现代化负面效应日趋显明的当代,如何进一步确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合理性的问题,如何对待“现代性”、如何面对“现代化”的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以往的经验似乎只给我们提供了以下两种选择:其一,由于现代性给我们带来了磨难,所以干脆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有

^① 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现代性基本读本》,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

些人开始主张中国停止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市场化、现代化的历程；其二，现代性是人类的必由之路，我们只能置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于不顾，让中国彻底经历一次西方式的现代性“洗礼”，只有等到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基本完成了才有可能解决这些负面问题。显然，上述两种观点都带有鲜明的极端化特征，都是“死路”，极不可取。前者要中国走回头路，后者则迟早会使负面代价葬送中国。我们希望和需要走的，是一条既能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能使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那种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的道路，这条道路在现实中的表现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则为这条道路寻找到了实现的可能性，并为确证它的合法性、合理性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资源。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的特点在于，它在激烈而愤怒地揭露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时，并不将其完全归结于现代性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希望现代人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而是要人们对现代性加以“治疗”。它努力地把物对人的统治追溯到人对人的统治，而不是把人对人的统治掩饰为物对人的统治。它深信，只要换一种社会制度，换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换一种价值观念，现代性理念以及作为这一理念具体实施的现代化运动完全有可能避免目前所出现的各种弊端。它对现代性以及现代化运动的负面效应的揭露和批判最终演化为对社会主义理想追求的必然性的论证。这充分说明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是可能实现的。联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来反思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我们绝不能放弃对现代性的追求，因为现代性对人类有积极意义，即使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也不是现代性本身造成的；其次，我们也绝不能放弃对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负面效应的关注与消除。既然在追求现代性过程中所出现的负面效应不是根源于现代性本身，那么我们更应当积极地寻找出现这些负面效应的真实原因，并且想方设法消除这些原因，使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在这里，我们要深切认识到，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上述要求，我们才能达到既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成果又避免现代性的各种负面效应的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坚持认为，人类走向现代文明是必然的，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高度文明的社会。在现代性理论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深得马克思为现代文明欢呼要颂的，因此，它才能为中国道路提供积极借鉴。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理论的现实性批判旨向,为破解中国现代化道路上所遇到的问题提供理论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难题和矛盾,这矛盾大体可以归为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人与自身的矛盾三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包含着经济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心理机制批判、技术理性批判、消费主义批判、生态危机批判等多重角度,在发现现代化问题方面具有现实性意义,在着眼解决现代化负面效应时,也抱着理论产生实效性的期待,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对发达工业社会的现代性批判后,将解救现代性危机的任务交由社会主义制度调节,虽然他们最终不免步入乌托邦的困境,但是其现实性的特点仍然不可为我们所忽视。并且,正是这一现实性的特点,有助于我们进行理论借鉴与问题启示,从而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借鉴。

其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如何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提供启示。生态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揭示了生态危机与资本逻辑的对立,从而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根源。马尔库塞敏锐地指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它是资本主义一切危机的集中表现。在这种制度下,自然完全屈从于“一种适应于资本主义要求的、工具主义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围绕生态问题的斗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斗争”。^①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的效用属性和增殖属性决定了资本本质上是反生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或生态的后果”^②。因此,他们最终诉求社会主义制度来节制资本对自然的无限利用,解决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之间的矛盾,进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③。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前行的,为我国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按照马克思的生态理论,显然在当今中国消除对自然环境日益严重破坏的

① 王振亚:《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多维透视》,《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1期。

② 俞可平等:《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1页。

③ [美]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石音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关键就在于限制无节制地追求利润的资本逻辑。

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如何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两极分化的日益加剧)提供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正确地梳理马克思的市场理论积累了许多思想资料。一些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改变马克思把市场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并进而认为社会主义无市场的观点。戴维·施韦卡特指出:“传统社会主义观点认为市场效率低是因为它无计划,社会主义有效率是因为它有计划。实践证明这种观点是错误的”^①,他极力倡导并努力从多方面论证市场社会主义的合理性。詹姆斯·劳勒则在题为《作为市场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的文章中明确提出“马克思是市场社会主义者”^②。当然,还有一些英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概念本身就是荒谬的,以截然对立的基点分析市场只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社会主义不存在市场。但是,正是在这种冲突论证和比较研究中,才有助于我们理清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佐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理性。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使我们明确了只有切实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把市场这种配置资源的方式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价值目标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消除目前两极分化日益加剧的现象。从而以此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重要理论成果,日益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信心,而且日益丰富和完善了具体实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路。

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能为我们解决人的身心矛盾、人的单向度的日益加剧问题提供启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可主体性原则的积极效用,他们批判工具理性的同时,希望通过对人道主义的弘扬可以解决现代性的危机和理性滥觞带来的负面影响。由卢卡奇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一种人道主义,而且围绕着人的本质、人的需要、人的交往、人的自由、人的价值、人的异化等进行系统的研究。他们的哲学具有一种实在性的主体倾向。葛兰西把人的问题放在自己整个研究的中心

① 毕金华、周仲秋:《市场社会主义的反思》,《吉首大学学报》2001年第9期。

② 李春放:《马克思是市场社会主义者吗——当前西方学术界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辩论中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年第8期。

地位,而且竭力论证世界统一于人,统一于人的实践。他认为所谓“客观”就是“从人的角度客观”,是“历史地主观”。^①生态马克思主义则要建立一种以“人为尺度”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自然观。佩珀曾明确指出:“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和人道主义。”^②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人的研究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思想进行阐述的,他们一是揭示了马克思对人的本质规定的全面性;二是揭示了马克思总是全面地、整体地论述人的异化;三是揭示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发展是使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兼容并包地、相互协调地全面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人的存在问题上对马克思思想的挖掘与传承,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现代化背景下探索一种使人身心协调的新存在状态,解决人的存在方式的矛盾,开拓一条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新路。

其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分析和施救于现代性危机时,所采用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解读方式,有助于我们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并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当代化。当面对空前深重的现代性危机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未决绝否定,也未逃避隐遁,而是积极在马克思思想中挖掘思想精华,并以一种开放的态度为马克思主义寻求新向度,也为现代性危机寻找可行的出路。一方面表现在对日益僵化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潮流的转轨纠错,另一方面体现为根据现实问题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救困境。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建伊始,就带有鲜明的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教条化的立场,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陷入静止甚至退步时期,还是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革命运动屡遭挫败的艰难时期,甚至是在苏东剧变的重大困难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自始至终强调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与解决现实问题上的精华与宝贵之处,并且努力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要素,与西方广博的哲学思潮进行融合,因此才出现诸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充分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开放历程。同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并非为了拼凑而拼凑,而是在进行现代性批判、解救现代性危机时,立足于所发现的问题,尝试以新的理论形式为现实提供出路。卢卡奇期待无产阶级意识觉醒来变革资本逻辑带来的

① A.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1971, p.445, p.446.

② D.Pepper, *Eco-Socialism: From Deep Ecology to Social Justice*, London, 1993, p.232.

物化问题;葛兰西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拾与挖掘,期待实践哲学的实效性得以彰显;法兰克福学派不断关涉着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错位的问题,希望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缓解主客体间的紧张关系,真正释放理性的积极力量;生态马克思主义更是从生态危机的角度提倡用社会主义制度来调和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尝试把一些现代西方哲学思想“补充”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去,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解读、多元化发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顽强生命力,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因地制宜的属性,推倒了原有的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佐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革命性,是面向现实、面向未来不断进行自我发展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理论。这就有助于我们更加坚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理论可能性与有效性的信心,更加有利于在方法、结构、经验上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汲取优秀的成果与养分,以为我所用,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中国化,坚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前景。